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

陈漱渝 主编
傅光明 编

下

解读萧乾

J I E D U X I A O Q I A N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主编 陈漱渝

解读萧乾

傅光明 编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南柯噩梦

仅仅六个小时，飞机就从隆冬的北京飞到南洋这四季常青、美得迷人的岛国。七天里，这里的十几位少男少女，像花团般簇拥着我们，轻快的笑声衬托出我的老迈。

日程排得够紧的。除了论坛，所有空隙都为参观排得满满。他们是那么以自己缔造的这小小共和国在不到三十年的辉煌成就而自豪。不但高楼大厦林立，俨然似座小纽约，而且经济上有亚洲四小龙之美称。所有东方人的随地吐痰、乱丢烟蒂、喧哗闹事等恶习，都在普及公德教育，提高环保意识和严格执法下，一扫而光。

当这里还是个殖民地国家时，我就曾两度来过，后一回还在这里以及半岛上住了一个月。那时的码头乱糟糟的，恍如到了上海的十六铺，人行道上不时出现伸手乞讨者。政权回到那里的人民手中以后，如今整洁得简直认不出了。所有破烂陈旧的建筑都拆个一干二净，重建起一座

整洁漂亮的现代化城市。

人是顶难满足的动物。破旧时想新的，可新的来了又怀念旧的。当我提起过去见到的这个岛那龌龊市容时，他们说，幸而大举拆建时留了一条老街，那里，一切原封未动。他们并建议最后一顿早餐大家就去那里吃。既饯行又访旧。

于是，那天我们一行就来到那低矮房屋、石板铺路的老街。人力车倒是已绝迹，满街跑的净是单（自行）车。如今，那里已成为旅游热点了。凡来访问岛国的，必然要专程来光顾一下。在当局，正可以通过对比，让远方来的客人们一睹岛国独立以后所起的巨大变化；而对旅游者，也可以在一片嘈杂人声中，印证一下旧时游记中对此岛的描绘。

东道主很在行，事先就选定一家以排骨茶闻名的饭馆。可以看出，店主预先早已知道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贵宾，所以就把我们让进一间挂着“别一天地”匾额的单间，然后深打一躬，表示对远来宾客的欢迎。

几天聚会日程排得太满，今天心情才真正轻快潇洒起来。席间边品尝着南国风味，饮着铁观音，边放声朗笑，天南地北地高谈阔论。大家似乎都有意避开本行（文艺）话，谈的无非是些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可座中一位衣着朴素，戴着深度眼镜，神态极为端庄的姑娘突然对我说：

有个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问问？我当然亲切地回答说，就是小组会，不也号召畅所欲言吗？何况咱们这样的聚会。请尽管说吧。

姑娘沉吟了一下，然后带点羡慕的语气说：我觉得同出现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作品的中国相比，我们这里的文学作品实在太苍白，太贫乏，太单调了些。中国有多少生动题材可写呀！又是反胡风，又是反右，尤其是那场热闹非常的文化大革命！

我一听呆了，愣了。我的骤然沉默把姑娘吓得也愣住了。她不知所措，直为失言而向我道歉。

我把排骨茶推到一边，手按着桌边无限感慨地说：“青年朋友，恕我直言，刚才你那话确实有点儿不知深浅。中国幅域和人口比你们大上不知多少倍，我们也才勉强经得住那么一通折腾——可确也大大伤了元气。倘若你们这个岛国闹上那么一场，不但再也不会会有什么文艺，恐怕连国家也就从这地球上消灭了！

“你们这里提倡东方的孝道。你们能设想会有野心家逼你们造反，把你们的父母及旁的亲人都打成牛鬼蛇神；留过洋的都叫洋奴，读过古书的都被骂成封建余孽吗？你们岛上会有多少人由于受不了那份侮辱而自杀。成天价会有人咒骂你们是狗仔子！你们还会准许手里有笔吗？不，每个中国人都希望生活在理性占上风的世界里，永远也不

希望倒退到中世纪——甚至原始时代。”

返京途中，坐在机舱里，睁开眼是机窗外的一朵朵白云，闭上眼却是一重重疑云。

就拿浩劫的开端说吧，一位学者市长听到主席夸起一位古人——清官，马上就响应号召，突击写出一台历史剧。旁的剧种出于拥护，也马上响应，纷纷移植。可不知怎的就触怒了老娘。她手下早已凑了一帮鱼兵虾将，个个迫不及待地为她效命。于是，一场批斗开始，把清官骂得不如贪官，忠臣不如奸相，接着就同反冒进的元帅挂上了钩。于是，就把个大好庐山闹得个地覆天翻。

另外，以“村”为名的三位革命秀才，写了几篇警世短文，无非是希望为政者脚踏实地，通情达理，行点德政。恰好几年前上边确曾鼓励过说大话之风，制造成千万饿鬼，把万顷良田夷为荒原，因而触到痛处。于是，就大举讨伐。三位秀才，随即逼死了两位。

所以说，十年大乱是以文字狱开锣的。其实，50年代就有人因写寓言而被问罪。那以后，历史题材——尤其涉及皇帝，就成了绝对禁区。

动乱自称是“史无前例”的，其实，也不尽然。中世纪的欧洲，就经历过一段黑暗时代。那时神权大于皇权。在维护宗教纯洁性的名义下，异教徒的帽子也曾满天飞

过。一旦扣上“巫”帽，就被绑上火种，活活烧死。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又是在欧洲，一批打着国家社会主义黑旗的歹徒，也曾残害过几百万人。1945年，当他们的焚尸炉还未冷却，毒气室墙上被害者绝命时在墙上挠的血迹尚未干透时，我曾亲历其境。80年代，我还特意又重游了那座杀人工厂。

暴行必然带来暴死。三十年前，各种残酷的死，并不足奇。史无前例的倒是死前之辱：从胸前挂大牌，姓名打红×，喷气式，坐飞机，以致给女同志剃阴阳头。不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吗？老娘就是先侮辱够了，才捅刀子。当然，也有不少像素日自尊心极强的傅雷，因不堪受辱，自行解脱的。

事过境迁，仔细想来，这场风暴的起因其实并不复杂。三十年前6月1日那张来路不凡的大字报已经讲得明明白白。另外，那位老娘除了指望有朝一日登基之外，她处心积虑、调兵遣将所要干的，想追回的，也无非是30年代她遗在沪滨的那几封情书和在租界巡捕房留下的指纹。为此，她就不惜派聂元梓去上海，任务交得十分明确，就是要把上海搞乱。

他们搞乱的可远不只是上海。

当尘埃落定之后，再来回首，又觉得这场史无前例来得并不突然。就像一口沸锅，火候总是逐步上升，由温而

热，由热而沸。追查莫须有集团仿佛始自一部古典名著。每次都先略为吹动，然后就形成轩然大波，从而株连大批无辜，闹得人人自危。言路堵塞，一味蛮干，以致全民饿瘪了肚皮。一位能人接了班，几年后大家填饱了肚皮，其夫人又大讲“桃园经验”，以至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复仇女皇隐遁已达三十载，乃磨刀霍霍，乘机亮相。于是，大灾难就此来临。

我百思不解的是：凭上面享有的绝对威望，把“中国赫鲁晓夫”赶下台，把30年代那些遗物一件不漏地追回都应不费吹灰之力。奈何非把神州大地整个投入水深火热之中不可？光一声“破四旧”，就把祖先遗下的多少文化珍宝毁于一旦？

单就那位老娘而言，她可绝不是什么失控。把上海搞乱，把全国搞乱，正是她用意所在。一乱，她方好浑水摸鱼。她勾搭一位军士，纠结了几员干将，打着革命的旗号，肆意绑架诬陷，并仿照当年纳粹纵火国会之故伎，贼喊捉贼，肆意栽赃。连存有30年代刊登有她玉照的画刊者，都可问成死罪。

革命原属进步事业，在这伙人等的怂恿下，革命却变成了邪教。一时挂忠字匾，设宝书台，扎忠字门，悬忠字旗，跳忠字舞。还要早请示，晚汇报，见面或打电话先得背一句话录，把主席语录糟蹋成符咒。十年间，书肆里只

剩下红宝书，舞台上只演那八个样板戏，文化成了沙漠一片。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一代青年学的是打砸抢，科技大学造起枪炮。咱这东亚古国整个回到了洪荒时代。这就是南洋岛国那个傻妞儿所羡慕不已的文革！

开头，利用纯洁的革命小将替他们行孽。等乱够了，又借莫须有的“五一六”把千千万万无辜青年投入冤狱。当时，我正在咸宁五七干校。夜审“五·一六”时，为了怕人们听到受刑者喊叫，就在野地里用土坯堆成窝棚，从零株连到一大帮。当时偌大中国，遍地是冤狱，甚至新疆也乱成一团，内蒙在捕风捉影地追缉什么“新内人党”。借拔白旗，把多少宝贵的科学家迫害致死，红小鬼出身的老干部被活活打死，多少受不住屈辱的人士举家自杀。

那时，自杀和他杀成为同义语。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有何区别！

一个野心勃勃而三十年来没摸着权的女人，一旦以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英姿出现，手握生杀予夺之权，她立意就是要把天底下碍眼的和不顺眼的，一塌括子置于死地。甚至为了日后取得第一把交椅，她一举杀尽知情者，从而强奸历史，为自己涂脂抹粉。然而历史并不那么驯顺，于是不惜一切地搜寻消灭自己在30年代遗下的丑恶行迹。

为此，地可不耕，机器可不转。造反（也即是破坏）

成了民族大业。派出所的桌椅底儿朝了天，大学理科试验室成了武斗利器的加工厂。暴徒成了革命者，理性和秩序全告歇业大吉。仁慈成为罪恶，告密诬陷成了革命行动。堂堂的煤炭部长就这么活活被鞭打致死。那时，现代化的北京体育场成了古罗马的斗狮场。只是被斗者身弯九十度，不得动弹，浑身毫无狮相。炮轰啊，火烧啊，油煎啊，大好的中国汉字变成狰狞凶恶。

至于那位怕见阳光的“五七一”工程的设计家，飞黄腾达的伎俩其实并不高明。他先是把小红书在手中不停地晃来晃去，然后在“伟大”二字的前边多多加上几个“最”字。如此而已。再有就是把女皇侍候得周周到到。凭这么几手，他就破天荒堂哉皇哉地被写进了党章。

然而也正是他，立意要把读书人“一锅儿端”，全流放到以“五七”为名的西伯利亚，让年已七旬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去沼泽地里放牛，让各科专家老弱病残在稻田里还覆着薄冰的时候插秧。刚赶下去不久，他就提出“四自给”，要他们永远离乡背井，真是弃之如屣。

我虽一向不信报应，却深信因果。种瓜得瓜，完全合乎逻辑。纸里总难包住火。“五七一”工程很快败露，随之继承人先摔后焚，化为灰烬。他的下场大可写成一部现代的《太上感应篇》。

“贼喊捉贼”原只是个比喻，可真正搞了政变的正是

那位成天嚷着要警惕政变的人。手挥红小书。其实，“接班人”的宝座已经明白写入大典，怎奈野心要远比野马更难于驾驭。他终于权欲熏心，一边明里喊着万万万岁，一边却在暗室里谋叛。

这位政变元帅在 60 年代的崛起，也很值得研究一番。他的窍门并不复杂，只不过无止境地抬，越抬他越受信任。水涨船高，他本人自然就这么浮了上来。旁人喊三声万岁，他喊三十声，三百声。于是，就成了得力助手，革命最牢靠的捍卫者。

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是实践完了要认识，然后再实践，再认识。当年打解放战争，估计是那么做的，所以歼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然而政治上想那么认识一下，需要的勇气可大多了。从半空跌成齑粉的阴谋家是当代从政者最生动的反面教员；要警惕那满口喊万岁的人！从后面捅刀子的，很可能正是此君。

不是提倡触及灵魂吗？要触，就得翻翻那最不愉快的一页。教训可真正是立竿见影。

然而投鼠忌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面子，只好将那最不愉快的一页，轻轻翻过去。身受其害的当代人反而佯做什么事也没发生，交给未来无切肤之痛的人去捉摸。

西人讥我为“算盘头脑”。总数出现了纰误，并不去查找错在何处。投鼠忌器，只哗啦一声，从头再来。因而

1942 年抢救，1955 年反胡风，1957 年反右，以至大跃进。这场文革，无非是一连串的登峰造极。每次死的人越来越多，国家元气越伤越大。这就使人面对未来世纪，还只能闭上眼睛撞大运。

不能设博物馆，可以理解。第一张大字报的难度就不好逾越。然而可不可以认真总结一下导致十年灾难的诸种历史因素？中国人连死都不怕，难道就怕抖落一下往日所吃之亏，所上之当？那结论对亚洲，对世界，也将是一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这方面畏畏葸葸，裹足不前，到 21 世纪又怎能阔步前进！

1996 年 1 月 25 日

（原载《同舟共进》1996 年第 9 期，

收入《玉渊潭漫笔》，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下 编

我的朋友萧乾

戴厚英

不是故意要用这样的题目让人肉麻，让人窃笑，或显示幽默，我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萧乾先生是我的朋友。

一般说来，我很少在比自己尊贵的人中寻找朋友，我不愿以故作的谦恭去换取尊贵者的提携，虽然这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坛至关重要；我害怕从别人眼里看到怜悯和降格屈尊的宽容，虽然这会帮我从泥潭中挣扎出来。我只想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过我这号人应该拥有的生活，甜时自得其乐，苦时好自将息。

我知道有一个萧乾，正像我知道有许多其他的前辈作家，我没想到会与他成为朋友。

那正是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日子，我独自一人面对不公的命运作着无力的挣扎，未成年的女儿是我最忠实的战友，她和我一起用复写纸一遍又一遍地抄写《我的呼吁和

申诉》，投向昏暗的远方近处。得到的回应是：善善恶恶尽沉默。对此，我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意外，有知识的中国人太懂得含蓄的重要了，于是我也沉默。

就是这样的时候，花城出版社转来萧乾的信，信中寄来了他在一份英文报纸上发表的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文章，文章对我的正在受难的《人啊，人！》作了客观的评价。

我不会怀疑萧乾对现实的洞察力，以为他不了解我和我作品的遭遇。我被他的信深深感动了。我立即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一份《我的呼吁和申诉》。

萧乾很快就写了回信，说他对我的遭遇感到震惊，他实在不了解写出《人啊，人！》这样的作品有什么罪。他说他要尽自己的力量把我从泥潭中拉出来，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呢。

我知道，萧乾是说话算话的，他确实作了许多努力。然而不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而是他过低地估计了人家，他没能使我的处境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从此我们成了朋友，成了知己。萧先生向我宣布，他将永远把我当作他的朋友，直到他弥留之际。

于是萧乾成了我这十年中通信最多的朋友之一。我在他那里辟了一扇心灵之窗，给他写信，从不顾虑，不寻章择句，心之所想，笔之所至，全都听任自然，有时长达数

页，有时三言两语。我知道在那些信纸上我留下的心灵轨迹是弯曲的，倾斜的，全没有人们所想象的“女中豪杰”的气概；但那才是真实的我。我想世上想做“强人”的人并不多，女人更是如此，“女强人”都是被生活逼出来的。她们所以没有被生活逼成疯傻乖巧之辈，甚至被生活彻底摧毁，并不因为她们有什么过人的智慧和力量，而仅仅因为她们固守着做人的最后防线——尊严，不肯丢弃知耻和不忍之心。如此而已。萧乾显然是理解这一点的。他对我信中表现的一切，诸如对命运的迷信，对前景的悲观，以至对死亡的向往，从未表示过惊异和失望。他只是向我传授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他是怎样度过自己一生中的沟沟坎坎的。他还不断地在做人 and 作文方面对我提出各种要求和希望，帮助我把眼光转向更为宽阔的人生和世界，我不能说，他把我从个人的坎坷遭遇中解脱出来了，这归根结底还要靠我自己，而且至今我也没能完全解脱。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年没有萧乾的帮助，我会活得更糟。

萧乾以丰富的人生在我面前打开一本十分有趣而又有益的書。这本书教我如何对待生活中的坎坷。

与萧乾相比，我的经历还算得上坎坷吗？他在“屋檐”下的悲苦童年，“梦之谷”的生死爱恋；他作过出生入死的战场记者，又当过受尽屈辱的“右派分子”；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表明他政治生活的起落，接二连三的婚变则